



编者按

中华民族历史悠久,文化灿烂。云岭大地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。云南人民勤劳勇敢,善良淳朴,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增添了光彩的一笔。千百年来,云南人民敢为人先,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以及国家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云南考察,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。云南广大干部群众在省委、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,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,奋进新征程,建功新时代,努力推动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。温故而知新,重温惊心动魄的大事件,比学可亲可敬的老前辈,凝望泽被后世的大工程,展现丰富多彩的风物志……对于鼓舞斗志,努力把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,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为此,本报推出大型人文历史纪实报道“昆明风云”,以读者的视角解读昆明人文历史,并请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书法家杜建民先生题写了刊头。同时,我们诚邀广大读者积极参与,提供报道线索请拨打本报热线(0871)64100000,投稿邮箱ccwbwq@163.com并注明“昆明风云”字样。

清朝乾隆年间开始,云南每年运铜至京所经陆路2200余里、水路8200余里

关山万里运京铜



石门坎小田坝村山崖上的运铜古道 会泽县文联供图



会泽公园广场中央矗立着一个高达二十多米的大铜钱 汤东波摄



纯铜建造的金殿 本报记者 苏颖摄



会泽县文管所收藏的宝云铸钱局铜锭 会泽县文联供图

明代马龙象战



马龙街头由云南艺术学院教授郇川设计制作的《忠勇义象》浮雕

明代天启年间,马龙州(今曲靖市马龙区)发生了大象参加平定地方战乱的壮举,可算一桩旷世奇闻。

万历年间,奢安之乱横扫川黔,西南大地狼烟四起。天启五年(1625年)三月,土司安效良纠集水西、古蔺两股地方势力再掀战乱。五月,水西土酋军队数万人抵沾益、占曲靖,抢掠民众财物,一路烧杀到马龙。

面对严峻的战乱形势,时任云南巡抚闵洪学一面表奏朝廷,一面令布政使谢存仁、副总兵袁善、参将尹启易及本地土司等,率兵数万抵达马龙平定战乱。

初始,水西军人数众多,明军势单力薄,局势危急。在此关键时刻,景东傣族陶氏知府受命率精兵千人及训练有素的7头战象,日夜兼程赶到马龙,支援平定战乱。两军会师后,陶土司按照7头战象各自的体形,分别给它们披上铠甲,又在战象的两根长牙前端捆绑锋利的剑刃,剑刃能随象牙前后左右自如挥动。7头战象聚在一起,像一座环立的小山,阔步向前如土山滚动。

战斗开始,陶土司指挥气宇轩昂的大象走在各路军队的前面,迎战汹涌而来的水西军。象队作前锋,加之陶土司的上千精兵参战,明军士气大振。

双方在马龙南面的松子山至北面的轿子山一带约8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激烈厮杀。据《滇游记》及《滇黔游记》等史载:战斗开始时,大象按照周密制定的突袭策略,白天潜伏山河,日暮月黑风高,7头大象以鼻吸泥水数斛,突然发起攻击,咆哮跳跃,直抵水西军战垒鼻喷泥水,并卷一人掷空坠死,其他人不知有如天降的是何庞然大物,因此惧怕而自相践踏。战象乘势分队奋勇向前,挺起矛一样的长牙,配合着利刃,威风凛凛冲向水西军阵地,真有撼山崩地、摧枯拉朽、所向无敌之势。水西军中有的被象鼻卷起抛向空中,有的被尖利的象牙和绑着的剑刃刺穿,有的被圆柱似的象腿踢翻、踏路……

明军鼓角齐鸣,乘势冲锋,喊杀声震天动地,水西军慌不择路,溃不成军。此时,安效良咬牙切齿,下令放射毒箭。一头冲在最前面的战象中箭,剧烈疼痛使它怒性迸发,在阵中横冲直撞,巨身所至,势不可挡……

经过五天的激烈厮杀,明军在轿子山的南面打败了进入马龙的水西军,全胜凯旋。再看这7头战象,其中一头战象,身上所中毒箭密密麻麻,取下的毒箭有一箩筐,射入皮肉的毒液渗进了大象内体,这头大象坚持了三天不幸毒发而亡。另6头大象,虽也不同程度中箭,但总算幸免于难。

马龙主政者告知全州各界,择黄道吉日,把阵亡的这头战象隆重下葬在马龙州城北面,令石匠刻石立碑,传诵其功。天启七年(1627年),墓碑落成,碑正中题写“义勇全城忠烈神象之冢”,两侧碑文铭刻了战象的不朽功绩。

明代马龙人杜其渐,写了《义象传》,说这头身中毒箭仍然“争先陷阵,死无二志”的大象,就是著名勇士孟贲、夏育也会“遇之其畏胆”,“熊虎当之亡其魂”。“论其威,则项羽之破章邯也;论其烈,则赵云之战汉水也;论其功,则金陵之救郢郢也;论其死,则张巡之睢阳也。”杜其渐认为这头大象是正义的化身,其功绩足以流芳百世。

明崇祯四年(1631年),到云南任巡抚的王伉途经马龙,专程到义象墓地凭吊,感慨不已写下四首绝句,称赞“分明物亦凛王征,一代关河九死争”,命令在象冢前建造牌坊,匾额题写“忠勇义象之坊”。进入清代,还有不少前人前往拜谒义象墓,写下了《义象歌》《象冢铭》《马龙州义象冢》等诗文。

如今,明未建成的义象冢及牌坊已经不存,但忠勇义象的故事和精神,仍在马龙大地传颂。

杨增外 文/图

(作者单位:马龙区委办、农业农村局)

并举的经济模式,经济社会长足发展。

经济影响。滇铜京运直接促进了云南地区采铜、冶炼、鼓铸、加工等铜矿业的迅猛发展,进而推动了云南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城镇的繁荣鼎盛。仅以东川府来看,年平均铜产量达800万至900万斤,最高产量为1400万斤。从铜厂人数来看,汤丹厂“厂民曾达10多万人”。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高度聚集,使得矿区成为一个需要大量聚集粮食、燃料、生产和生活物资的区域。

文化影响。滇铜京运带来云南铜矿业的迅猛发展,引发了清代的移民浪潮,陕西、甘肃、安徽、江西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广等10余个省份的富商大贾、贩夫走卒、矿工、工匠、民夫、文武官员云集于云南。云贵总督张允随曾于乾隆七年(1742年)和乾隆十一年(1746年)先后奏称:“外省游民流入滇境者不下数十万,皆赖开矿走厂度日。”“滇省……惟地产五金,不但滇民以为生计,即江、广、黔各省民人,亦多来滇开采。”滇铜京运带来多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,构建起了云南多元和谐的文化格局。如今,素有“万里京运第一站”之誉的会泽白雾村尚存的会馆、文庙、清代四合院以及四合五天井、走马转角楼、三坊一照壁等诸多建筑样式,就是滇铜京运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流、交融、和谐共存的历史见证。

刘鸿燕(作者单位:云南省社科院历史、文献研究所)

今年1月,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、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《云南省“十四五”城乡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》,制定了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“十四五”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,在加强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中,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滇铜京运等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保护,扎实推进集中连片保护发展试点示范工作。

滇铜京运,史称“南铜北运”,始于清雍正五年(1727年),终于宣统三年(1911年),前后历时185年,是关系清王朝财政金融兴衰成败的要政、大政。

半程又改为陆路为主。

铜运改程后,铜料仍在象鼻岭集结,由马帮驮驮,过小江,沿大湾子爬高家坪经云峰进娜姑达白雾,再由白雾至东川府城(今会泽县城)。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,巧家富绅刘汉鼎捐资修筑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,古道起自小江口,终点为东川府城(今会泽县城)。乾隆五十六年(1791年)道成,“较旧近二十余里”,此后,铜运马帮和民间往来均改行此道。京铜运至东川府城(今会泽县城)办理通关文牒后,即由会泽北上昭通,经大关、盐津直入金沙直达泸州总店。至今,会泽县娜姑境内仍留存有两段保存完好的铜运古道,一段为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,另一段为云峰铜运古道,均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滇铜运到泸州后,陆运基本结束,开始水运。运铜船队从泸州起航,至扬州仪征市大运河口起驳,大船满载京铜扬帆北上,在通州上岸,到京城户部和工部交货。至此,一次完整的滇铜京运始告完成。通常情况下,东川府每年运铜4次,从泸州至北京水运路段,每次有8支船队,每支船队13艘大船,每艘大船运铜6万余斤。陆运则需马匹9000余匹次。每起京运的期限,大约为一年,交铜后,从京城返回云南的时间限定为99天,延误或超期都将受到相应的严厉处罚。据《云南铜政考》一书统计,滇铜京运陆路2200余里,水路8200余里,全长万里之上。

为清王朝财政金融作出巨大贡献

【影响深远】

运输过程包括三个阶段

【自滇至京】

朝廷采纳。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,朝廷在昆明设立官营铜店,为各省采购京铜创造了条件,初步形成了云南铜矿业采、供、购一条龙
 的体系。

与此同时,从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到雍正八年(1730年),长达31年在东川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,极大地推动了东川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,东川铜矿业进一步兴旺发展。雍正四年(1726年),东川由四川划归云南,同时增开汤丹等厂,铜厂大增。一向注重矿山建设与开采的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朝廷:滇省增开汤丹等厂以来,铜产量大幅增加,除了本省使用,每年有余铜200多万斤,官方无力采买,建议朝廷动用盐税余款收铜,再“转运至江南等省,令收买还项”。这一奏疏得到朝廷批准:“将滇省余铜,令该督动盐务银六万两收买,委员以一百余万斤运至汉口,以备湖北、湖南采办之用;以一百余万斤运至镇江,以备江苏采办之用。”雍正五年(1727年),东川所产之铜外运汉口、镇江,然后转运北京,标志着滇铜京运正式开始。

乾隆三年(1738年),朝廷全面停止采办日本洋铜,更大规模的滇铜京运随即拉开序幕。

清代沿袭明制,在京城工部和户部分别设立宝源局和宝泉局,并在各省设立铸局。清顺治元年(1644年)开始鼓铸“顺治通宝”铜钱。清前期的几代皇帝吸取元、明因开矿引起动乱的教训,一般都严厉禁止开矿。随着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迅猛发展,人口的迅速增加,货币需求量随之剧增。因此,解决日益剧增的铸币所需的铜料,成为关系财政金融稳定而亟待解决的大事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海禁开放,中国铸币用铜就几乎全部从日本进口。但好景不长,康熙五十四年(1715年),日本德川幕府开始实行“锁国”政策,严禁
 铜矿出口,包括铜矿在内的各种矿产资源也严禁出口,清政府铸钱所需之铜只得转而依赖国内矿山。

云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,其中铜矿储量丰富,“滇多矿而铜为巨璧”(吴其浚《滇南矿厂图略》),开采历史尤为久远,早在3200年前的商代晚期就已进行开采和冶炼,至明嘉靖年间所铸“嘉靖通宝”钱
 币则宣告滇铜铸币历史的开始。清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,云贵总督蔡毓荣上奏《筹滇十疏》,提出以滇铜之丰饶,应“鼓铸宜广也”“矿铜宜开也”的理财之策,建议大力增设铜厂,广泛开采铜矿,得到

朝廷在昆明设立官营铜店

【滇铜丰饶】